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 时代境遇、核心要义及其现实启示

□ 蔡 芳 李 婧

摘 要：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在冷战格局下多元政治力量兴起，国际竞争由军事实力向综合国力扩展，国内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等时代因素的作用下产生。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统一、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相协调，对新征程下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时代境遇；核心要义；现实启示

作者简介：蔡 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李 婧，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24）

DOI: 10.19865/j.cnki.xxdj.2024.13.002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24)13-0008-05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基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不仅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而且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世界正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安全形势变幻莫测，维护国家安全压力愈发增大，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对于党和国家掌握国家安全战略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时代境遇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生成于冷战格局下多元政治力量兴起，国际竞争由军事实力为主扩展为以综合国力为主，国内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中，是对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作出的积极回应。

1. 世界格局新形势：多元政治力量逐渐兴起。国际形势是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关键依据。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和苏联交替进行战略收缩，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群体性崛起。从欧共体扩大和发展，到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到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影响力扩大，再到第三世界国家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国

际呈现出多元政治力量兴起的新形势。崛起的新兴力量战略取向倾向于分散，并且为了摆脱大国控制，很多新兴国家拒绝以制度形态作为对外策略的主要标准，使得单个国家能够单方面控制全球事务的可能性不断降低，各国之间平等对话和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不断提升，世界走向和平未来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基于世界格局的变化，革新安全理念成为必然的要求。

2. 国际竞争新模式：由军事实力竞争扩展到综合国力比拼。竞争是国家间互动的主要方式，也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受美苏恶性竞争引导，世界各国纷纷将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向扩军和备战，形成了以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为主的国际竞争模式。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东石油危机爆发，恢复经济活力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在普遍的经济发展的需要驱使下，原本紧张的军事对抗势头出现了减弱趋势，为了能够在世界政治格局中获得优势地位，许多国家开始将竞争的着眼点从军事向着经济、科技等综合领域扩展。在西欧国家率先通过“尤里卡”计划之后，日本也确立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则开启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科学研究之路。随着国际竞争

模式的变化,国家安全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继续强调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的同时,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纳入了国家安全的内容范畴,推动国家安全意识实现了更高层次的跃升,这也为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3. 国内任务新变化: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1](P557)},国家安全工作也随历史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了防止新生政权被敌对势力颠覆,党形成了以巩固政权为核心任务的国家安全思想。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中国经济因为先天基础薄弱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遭遇严重挫折,导致经济发展整体落后于西方国家,邓小平明确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发展既需要国际上的和平环境,也需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基于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充分吸取过去片面强调矛盾斗争性而忽视统一性,导致将“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2](P313)}的深刻教训,顺应国家战略的调整,推动我国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向“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彻底转变”^{[3](P115)}。

二、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要义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是一个站位高远、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统一,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相协调。

1. 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统筹。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国家安全的维护,但与西方国家所持的只强调零和博弈,忽视命运与共的狭隘安全观不同,他既关注国家安全又重视国际安全,追求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筹谋划。一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最高准则。在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上,邓小平一贯立场明确,认为国家主权和安全必须始终放在第一位。在面对英国政府提出要“以主权换治权”时,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4](P12)},不允许有丝毫的退缩和让步。针对“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等别有用心的

错误言论,邓小平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5](P345)},没有主权就没有民族尊严,也就没有人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6](P3)}。邓小平坚持胸怀天下的格局,提出中国作为国际少有的大体量国家,与世界安危与共,维护国家安全“是对中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和全人类负责”^{[7](P361)},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

二是着力维护国际安全。邓小平十分强调国际安全的维护,认为西方国家坚持的“‘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8](P96)}的安全观,只会激化矛盾,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使各国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必须打破只维护强国和富国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和强权主义者利益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树立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安全观。邓小平还特别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战争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9](P491)},必须将反霸斗争进行到底,变革以霸权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此外,邓小平将国际安全与发展视为一体两面的关系,认为维护国际安全,还要重视解决国际社会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问题,重点通过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国际社会获得长久安宁。

三是以辩证视野审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是辩证统一的,由于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既定政策不变,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纠纷等问题长期存在,中国国家安全始终面临挑战;但同时也指出,关乎国际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各国之间联系和交流在加强,安全的依赖程度在加深,世界在很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也将迎来新的希望。因此,邓小平主张顺应和平与发展条件下绝大多数国家以发展为核心任务,对和平也都抱有很强期待的趋势,调整国家安全策略,特别是要革新“掠夺与被掠夺、侵略与被侵略、征服与被征服”^[10]的冷战思维,极力促成国际共同安全共识和合作的达成,推动世界向着和平与发展的光明未来前进。

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统一。邓小平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与只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思想不同,他主张要实

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内容相统一。一是重视政治安全,以巩固、加强党的领导为关键。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维护国家安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必须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要改革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贯彻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好和培养好接班人;要重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做到“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11](P144)}。东欧剧变之后,面对西方国家妄想在中国挑起所谓“合法性危机”的图谋,邓小平更是充分展现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的责任意识,提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样才能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

二是重视经济安全,以经济发展为治本途径。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的时代性问题。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就在全科学大会上明确提出,只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12](P8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进一步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3](P502)}。在总体把握经济发展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他还立足不同方面,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阐释,提出经济建设是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主要条件;是满足人民需要,改善社会精神面貌,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基础;是决定国防潜力、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战胜资本主义和一切风险与挑战的基本条件,充分揭示了经济建设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重视文化安全,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重要任务。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捍卫文化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后,西方势力伺机而动,鼓动国内极少数反动分子掀起了公开怀疑、否定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我国文

化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对此,邓小平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是让“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14](P207)},但中国“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15](P168)}。这一立场鲜明的观点,纠正了一些党员干部和群众对自由化思潮的错误认识,使之形成了反自由化斗争并非一般思想分歧,而是“主义之争”“道路之争”的深刻认识,为破除西方“以压促变”阴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依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演进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捍卫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捍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老祖宗”,守好意识形态阵地。

四是重视军事安全,以建设现代化国防为重要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关系国家安危和发展全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将军队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对于建设现代化国防,邓小平认为重点在于提高国防技术水平,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具体要紧密联系世界军事发展形势,加强先进武器装备研发,搞真正顶用的“杀手锏”。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提出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不仅要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建设,提高军队党性,消除派性,建设“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16](P334)},而且要彻底改变军队“肿、散、骄、奢、惰”以及机构重叠、臃肿等问题。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了各种军事章程条例,改革了诸多不合理的军事制度,推动人民军队管理迈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水平,也提升了国家安全的战略保障能力。

3. 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相协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依据经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重点,国家一切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要求,形成了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相协调的思想。一是以改革促发展,协调好改革中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经济体制僵化、政治体制不健全以及外交相对封闭格局下,被束缚的生产力、被挫伤的群众积极性以及日趋尖锐的社会内部矛盾,邓小平严肃指出,中国急需一场改革式的新革命,如果不实行改革,“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7](P150)},只有通过改革清除附加在社会主义之上

的一些错误认识,革除存在于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各领域的弊端,才能打破发展僵局,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使国家安全更有保障。邓小平虽极力主张改革,但也认为改革无法做到万无一失,所以要求改革“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18](P371)},要做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的方式、时机、力度、范围与国家发展需要相适应,实现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安全。

二是以开放促发展,协调好开放中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开放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就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所处境遇的深刻分析提出,任何国家和民族要实现安全与发展,都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以开放促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又多次强调,中国要自立于世界,不可能搞孤立和闭关自守,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为了深化社会各界的认识,邓小平全方位阐释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意义,指出对外开放能够广交朋友,分化敌对势力,减轻外部安全压力;能够借助或利用外部资源,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有益于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发展注入活力。然而,邓小平也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诸如会出现利益冲突、外部风险侵入等复杂情况,因此,必须采取稳妥的开放方式,协调好开放中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三是构建富有效率的安全体系,使安全更好地为发展服务。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同时也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能否协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关键所在。冷战期间,许多国家为了追求本国安全,盲目扩大战备规模,以至于为了安全不计成本,结果使经济发展受挫,国力严重受损。邓小平在深刻吸取其他国家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适度原则,尤其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更要摆脱临战思维。邓小平虽然高度认可安全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但也认为在生产力发展严重不足乃至落后时,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安全。因此,他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确保安全与发展之间资源配置的平衡,重点要构建使国家安全所需国防力量规模与现实需要相适应的富有效率的安全体系,让安全更好地服务于发展。

三、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现实启示

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境遇,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对新时代党和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改革开放初始,与世界很多国家坚持从单边主义、绝对主义、无政府主义角度思考国家安全问题不同,邓小平先导性提出要从各国安全关系的竞争性中把握统一性,建构了立足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又着眼于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安全观,阐明了人类社会共生安全的逻辑。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面对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代境遇,明确提出了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现了对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在国家安全维护方面的共同协作,致力于通过国际主体之间共生关系的互构,促使世界实现长期的和平稳定。当前,大国博弈与地缘角逐持续升温,各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和风险持续增加,我们只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才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坚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准确把握了国家安全形势的变与不变,根据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统一了传统安全与时代安全内容,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的变革性发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面对“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19](P235)}的状况,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建构了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等众多领域的“大安全”体系,揭示了国家安全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综合性,实现了对以往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突破。当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做到以系统思维分析形势、研判风险、明晰战略,从而科学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3. 坚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立足国家发展审视国家安全问题,揭示了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产生了重要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互为前提和保障,作出全面提高国家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以确保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在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内在统一规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低增长、高通胀、高成本、高利率、高杠杆、高不确定性”的特点,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样也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难题。只有坚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不断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同时筑牢国家发展的安全防线。

(上接第7页)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28](P378)}。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两手都要抓,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充分体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伟大的、生动活泼的、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理念,从而也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丰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为之在新时代的创新提供了持续的科学引领。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29]。

参考文献:

- [1][2]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 田克勤,李婧.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2][15][17][1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5][6][7][8][11][14][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0] 任卫东.传统国家安全观:界限、设定及其体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4).
- [1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责任编辑 罗钰涵

- [3][4][24][2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6][7][8][9][10][11][12][13][14][15][18][26][27][2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2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3]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9]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N].人民日报,2014-08-21(2).

责任编辑 罗钰涵